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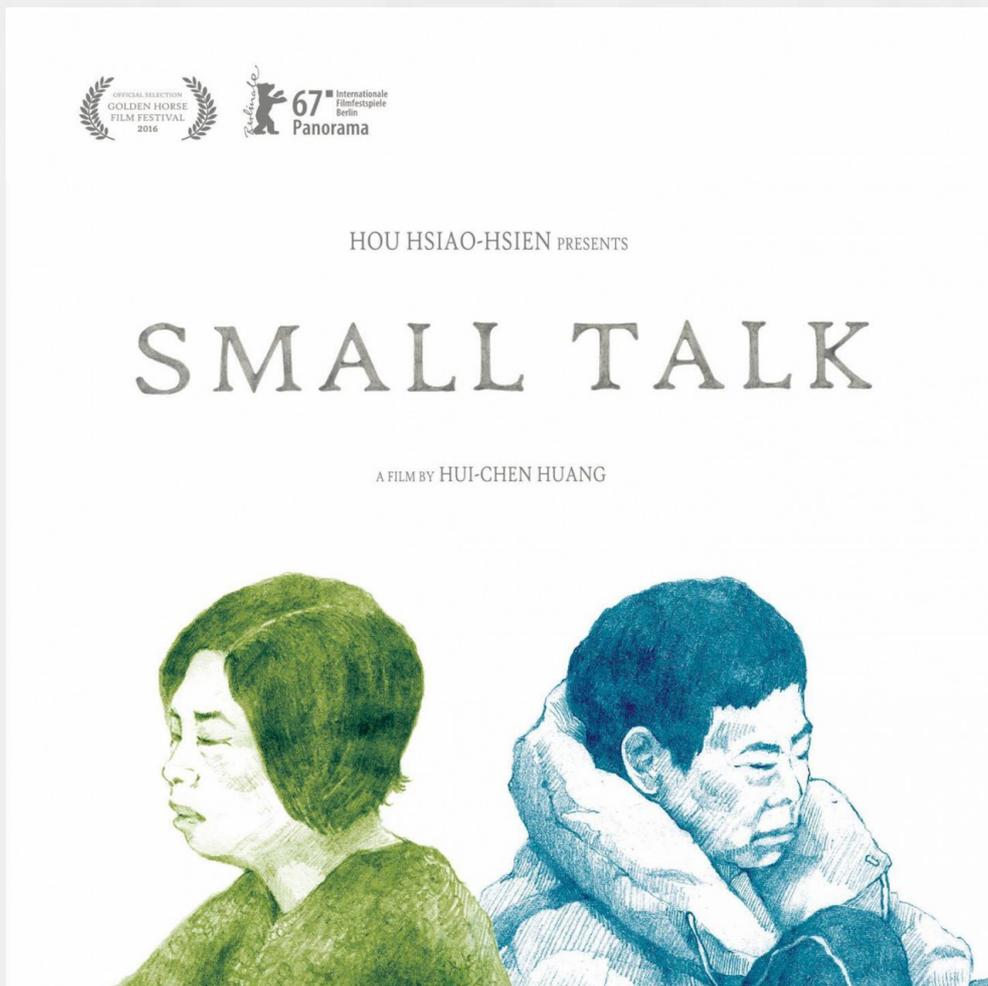


日常對話 對你講出心內話

簡文怡 文

2018/05/20

黃惠偵導演以影像洗滌傷口、超渡黑暗。這是她與母親間不得不說的故事，隨著長大成人，原先以為可以忘卻的傷痛，卻在沉默中越發清晰，而導演自己成為母親之後，更多了全新的觀點與勇氣去理解母親。《我和我的T媽媽》（54分短版）、《日常對話》（89分長版）以及《我和我的T媽媽》（書）都在企圖找出痛苦背後，那些愛著彼此的證據。



《日常對話》海報，此片獲得2017年泰迪熊獎、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獎項。（圖片來源 / [日常對話 Small Talk](#)）

招魂、超渡、入土

黃惠偵的生命故事相當戲劇化。因年少失學、父親家暴、有一個女同志母親、母親是牽亡陣的紅頭法師（台灣的民俗儀式，由法師作法，帶領亡者前往西方極樂世界）、從小與妹妹做牽亡使者賺錢等而被貼滿了各式「社會邊緣」標籤的她，在因緣際會之下，遇見了紀錄片，才發現不需要等待別人來詮釋，自己就能為自己說話。



《我和我的T媽媽》中將牽亡儀式的概念融合，象徵超渡過去的黑暗記憶。（圖片來源 / 酷兒影展）

父親是橫亙在母女中的一道牆、不能被提起的過去，直到多年以後，即使母親早已帶著兩個女兒逃離那個家，她們心裡卻從未離開過。陰影壟罩太久，讓母女倆像是活在同一個屋簷下的「生份人（台語，陌生人之意。）」小心翼翼地揣度對方對自己的情感，「媽媽會不會怨恨我們？她愛我們嗎？」那些問不出口的問題，最終藉由攝影機，才還給了他們一個對話的機會。

在幾乎相同的素材、不同的剪輯手法之下，《我和我的T媽媽》帶著更多宗教的色彩與濃厚的情緒，以牽亡法事的順序為引，招魂、超渡、入土，就像母親的職業一般，帶領母女藉由對話，放下過往的苦痛、前往幸福的所在，可以感受到在那有限的時間裡，迎面而來的，是導演耽擱多年的強烈情感，急切想要展示給母親或是局外人。而《日常對話》的步調則更為舒緩，不再以段落區分，一氣呵成，多了更多導演的口白、綿長而微小的細節，是一封在沉思過後長長的信，寫給母親、也寫給自己。書本則補足了影片未提及的細節，沒有過多形容詞的字句，乾淨俐落、甚至是有些殘忍地刻畫出過去，有自年少就叛逆的母親、母女生命中的女人們、妹妹、在生命中缺席的父親，以及自己。當過去被揭開，才有往前進的動力。

「傷痕，並不丟臉。」摘錄自書中導演的自敘，「我希望大家看見的是自己，看見自己的傷口，看見自己為何跨不過去，看見自己還有修復的能力。」

什麼是正常？什麼是不正常？

不論影片還是書中，都圍繞於一個很大的命題，「正常與不正常」。

也許是小侄女天真地問「阿姨，阿嬤是查埔仔還是查某仔？」，又或者是導演端著攝影機，詢問母親家族中其他長輩「你們當時知道我媽媽被打嗎？你們不覺得她很可憐嗎？」這些問題都揭露了社會主流價值觀，如何深深地影響所有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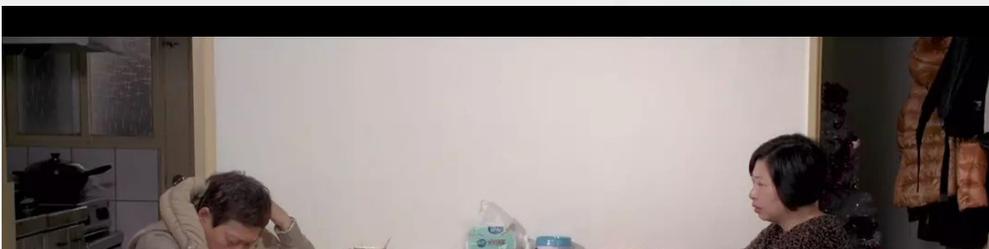
「男大當婚、女大當嫁」，是母親苦難的開始。與異性結婚無疑對同志是痛苦的，再加上家暴與養活小孩的心理負擔，讓一個母親從小教導自己的孩子喊父親「死沒人哭」，那樣的恨意，卻是親戚口中輕飄飄的一句「知道啊，有什麼好可憐的？」。黃惠偵也在影片中口述，曾被認識的長輩指著說「你媽媽是同性戀，是變態，你是變態的小孩。」當時的她急切地想逃離、甚至怨嘆自己生錯了家庭。直到拍攝紀錄片，才得知母親從以前都對外宣稱她的小孩是「分來地」（領養的），發現自己與母親逃避的姿態何其相似的同時，更不捨母親只能藉這樣的謊言來維持尊嚴。

未出嫁的女兒無法供奉上桌、包辦婚姻、家庭暴力這是「正常的」，而同志、養活導演一家人的牽亡歌陣是「不正常的」。這些黑白劃分的價值觀由誰定義？正常就能帶給人們幸福嗎？這樣的問題會隨著觀影的過程中，不斷盤據在腦海。最傷人的或許從來不是非主流，而是某些價值觀所帶來的枷鎖。「儘管你們教我歧視仇恨我的母親，並對我的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，但我不會計較那些，因為我的同志母親教會我的那些，不是恨。」黃惠偵在書中寫到。

對話好難 如何說愛

黃惠偵從二十歲就有想要拍攝家中故事的念頭，然而一直到十五年後，有了與自己血脈相連的女兒，才發覺有些問題是無法逃避的，這個柔軟的小生命帶來的，還有與母親未開始的對話。

「媽，我今天要告訴你，我為什麼想拍這部片。」母女兩人各據一方，一張餐桌、三台攝影機，她們第一次面對面揭開傷疤。這是《日常對話》與《T媽媽》中的經典片段，比起對話、更多的是沉默。黃惠偵心中一直都有著一個秘密和深深的恐懼，害怕不被母親愛、害怕被丟棄，明明一直多年來相依為命、卻時刻覺得對方討厭自己。





餐桌是貫穿於全片的象徵，代表著母女關係的變化。（圖片來源 / IMDb）

愛是一再反覆的主線。黃惠偵與女兒相處時，不自覺流露的真情，就像一面鏡子，映照出另一段母子關係；相反地，黃惠偵與母親雖同在屋簷下，交集卻只有餐桌，片頭開始時，母親總是煮好菜就出門，在外面總是比在家開心的多。母親從不掩飾她對女朋友的柔情，對於女兒卻更多是沉默。有些心事說不出口，雖然不代表不愛，但不溝通、不了解，就只能當一輩子生份人。片中，黃惠偵哽咽道，「我在生了囡仔（小孩）了後，每天看著阿平（女兒）我就歡喜，伊每天看到我也足歡喜，我一直在想，希望我的媽媽每天看到我也會歡喜。」對話之後，場景從各自的廚房、各自的餐桌，變成為祖孫三代的廚房、祖孫三代的餐桌，不論如何，母子之間終究是有著牽絆的。

用影像紀錄真實 看見真實

母親從不隱瞞女友的存在，帶著阿姨們回家、出手大方，玉鐲、金飾，還有極盡的溫柔，來來往往交過十幾個，可說是把妹高手。比起「出櫃」的母親，「被出櫃」的親人更多選擇忽視這件事情。問到家中長輩知不知道媽媽喜歡女生，所有人都異口同聲的表示「我毋知啦。」而對於母親來說，喜歡女生並不丟臉，跟她一樣的人有很多，在台北橋有一大群。反而是被家暴令她感到羞恥，「為啥大漢了後，攔末分人打？（為什麼長大以後，還要被人打？）」

《日常對話》與《T媽媽》的格局很大，不只是同志紀錄片，更寫出了一個時代中底層人物的處境，這些矛盾、痛苦，藉由鏡頭一一再現。製片曾多次詢問黃惠偵為什麼拍攝紀錄片，她認為「不能透過只透過文字或是劇情片的演出，當社會不想看見某些真實的存在，我們就應該被真實地看見，活生生地，讓他們無以迴避。」她要社會看見，母親與阿姨們之間的感情是真實的、同志家庭之間的相處是真實的、加諸在他們身上的標籤也是真實的。

黃惠偵在書中寫道，她不確定三十七歲是不是最適合的時間點去完成這部影片，但是一定比二十歲的自己更有能力，少了些許怨懟與恨意，更了解如何去安置和理解那些記憶。

餐桌上的對話，離說愛還太難，但這些影像和文字都會成為安神的咒語，領著彼

此走上回家的路。

□ 回到【彩虹路上】專題



記者 簡文怡



編輯 馮瑜庭